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三九〇）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五五六期 ——
（二〇〇七年二月十九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702d）

【书刊评论】专制政客的翻供状——评《聂元梓回忆录》	薄亚达
【研究报告】四五运动的背景：七次冲击波	陈子明
【当事者说】北京市抓“五一六”的情况	吴 德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书刊评论】

专制政客的翻供状
——评《聂元梓回忆录》

• 薄亚达 •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上世纪中期在神州大地上波翻浪涌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已随时间的逝水，无情地隐入历史，几个在潮头浮动的“乱世英雄”，也随之沉没于渺茫的人海浪谷。然而，总还有“英雄”不甘于沉寂，在新世纪制造错乱的“回忆”，以图洗刷自身深重的罪孽，在历史的殿堂中塑造自己的金身。这样顽强不屈的“英雄”，当数所谓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领衔者、北大的“老佛爷”聂元梓了！她在香港时代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聂元梓回忆录》一书，便是这样的文本。

所幸，当年的历史见证者，大多依然健在。当年仗势欺人、掌权吃人的“老佛爷”，如今只是一个刑满释放后的普通公民。在历史面前人人平等，我们现在可以与她一起平等地以公民身份总结历史，评判是非了。

一、善与恶

孟子认定“性本善”，荀子则认为“性本恶”，不管本来如何，善恶之分，历来是界定一个人的普世标尺。无论聂元梓作为一个共产党的“老干部”也罢，作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领衔者也罢，还是作为一个北大的女人也罢，均可以此标尺来衡量她。她一生的盛名期是在北大的“文革”，她在北大“文革”的表现则突显了她的本性，我们自然据此来论证她。

聂元梓因“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领衔者而受到了高层的宠幸，一夜之间在全国暴得大名。顿时，她成了北大的至高无上的人物，成了真理和权力的化身，成了革命与否的分界线。她的名字，则与毛泽东主席联系在一起，与文化大革命和中央文革小组联系在一起。风助火势，这种政治气候，使她的恶性得以膨胀，名令智昏，忘乎所以。于是，经她本人及其追随者的苦心营造，北大形成了“反对聂元梓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聂元梓就是反对中央文革”、“反聂即反动”的铁血逻辑。在这种逻辑的棒喝下，即使只是对她稍有不同意见者，也遭无情打击，一些恂恂学者和纯真的青年学生在政治上因此而被置于死地。

1966年冬天，北大学生中出现了名之为“井冈山”和“红联军”的松散性群众组织，对聂元梓和“校文革”（文化革命委员会）提了一些意见，有的人也表达了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一些异议。这两个组织即被定性为“反动组织”，其中200多人挨批挨斗，100多人被打成“反革命”。斗争之残酷，涉及面之广，远胜于陆平对待社教积极分子和张承先工作组对待“反动学生”。中文系一九六二级女学生沈达力，只因参与“红联军”，对聂元梓有所意见，便遭到了无情的批判和公开的羞辱，无奈服毒自尽，命丧红湖之畔。聂元梓的“社教”（“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战友”孔繁、杨克明（“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执笔者）郭罗基、张侠、杨勋等人，对她提过一些意见，即被认定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是“阴谋家、野心家”，或遭批判，或遭殴打，甚至被送进监狱……这些恶行，都是聂元梓在书中自称与之“斗争”的中央文革与江青的强力支持下，而贯彻执行的。

北大的师生，决非盲人和愚人。他们将善恶清楚地看在眼里，记在心中。虽然一时迫于高压，隐忍沉默，北大一度寂然无声，出现了所谓的大一统局面。但是如此情景，又怎能长久得了？不久，便出现了旨在批判聂元梓的“东方红”、“井冈山”、“红旗飘”、“北京公社”（又称0派）等群众组织。他们先是活动于地下，潜行于校外，并于1967年6月5日，借陈伯达发泄对聂元梓不满之机，从地下破土而出。后来，这几个组织又与新北大公社内部的揭竿起义者革命造反总部（又称“团”派），“井”、“红”、“飘”、“零”、“团”，五个群众组织在反聂的旗帜下，组成了有5000多人的并得到校外群众广泛支持和同情的井冈山兵团。上山者上至北大副校长周培源、名教授季羨林、周一良、侯仁之……下至普通职工学生。呵，北大的“右派”翻天了，他们居然敢反大“左派”聂元梓？！人们面对强权，强人和强势力量，不顾“反聂即反动”的铁血逻辑，刚强地显示了人性之中的善良与正义。正如季羨林后来在回忆“文革”的文章中所述：“我一生做的事自己满意的不多。我拼着老命反‘老佛爷’一事，是最满意的事情之一，它证明我还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胆小鬼”（《记周培源先生》）。如果没有聂元梓掌权后，残酷打击和排斥异己，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的恶行，何以有后来井冈山兵团的崛起？善恶从来如冰炭，水火不相容，乡间里巷如此；中国最高学府，素有革命传统的北京大学，更是如此！

井冈山兵团的崛起，她在校内外批判聂元梓的巨大能量，成了聂元梓政治和道德上的最大威胁，成了燕园里异端的洪水猛兽，成了“大一统”聂家王朝的逆子叛臣。聂元梓誓欲除之而后快，先施以文攻，强化“反聂即反动”的政治威慑；后则加之以武斗，操纵新北大公社，四处抄家，抓人，并于1968年3月29日凌晨，在暗夜里抢占了31楼，首先挑起了北大的大规模武斗，从而形成了长达四个月的对“井冈山”群众武装包围的局面。一时，燕园学府，顿成长矛耸立、弹弓四射的战场，燃烧瓶燃于前，土坦克备于后，许多人因此致伤致死。19

68年的春夏，是北大历史上最奇特最血腥的日子。

武斗前后，聂元梓领导下的新北大公社，在民主楼附近设立了“牛棚”，关押了一百多名包括陆平、季羨林在内的“牛鬼蛇神”。他们抄了周培源的家（企图绑架未遂）；对“井冈山”派学生断粮、断菜、断电，无所不用其极。生物系学生樊立勤被抓，遭到了惨无人道的迫害，老虎钳夹断了手指，膝盖被钉子钉得粉碎，竹签子钉进手指。地质地理系学生刘玮，被抓到他们控制的楼里，多人用自行车链条等器械，活活将其殴打致死。无线电系学生殷文杰经过新北大公社占据的楼房门前，竟然被一个女社员冲上前来，用长矛将其刺死；地质学院附中学生温家驹因到“校文革”掌控的图书馆翻阅书籍，也被殴打致死……各种恶行，令人发指。它们均是在“保卫红色政权”、“保卫革命左派”的红色口号下，对“企图翻天”的“井冈山”的“反革命分子”、“右派”进行的堂而皇之的“革命暴力”。

聂元梓是当时北大有权有势的最高领导人，她领导下的新北大公社首先挑起了武斗，残害了许多对自己持不同政见的师生员工，聂元梓是无法推卸个人责任的。如果说，当时的聂元梓处于特定的时空环境中，神志不清、头脑发热的话，那么事隔数十年之后，聂元梓倘有一点儿良知，她应该向遭到迫害甚至丧命的师生员工及他们的亲属忏悔。聂元梓丝毫没有悔过之心。在“回忆录”中闭口不谈长达四月的“围剿”“井冈山”的大规模武斗；对“牛棚”中受迫害的许多教授、干部置若罔闻；对镇压“井冈山”、“红联军”，以及沈达力之死无动于衷；对刘玮、殷文杰之死轻描淡写；对残酷迫害樊立勤只字不提！聂元梓没有忏悔，不忏悔表明了她的本性如此，表明了她的无可救药。人不怕犯错误，知过能改，亡羊补牢，犹有人性。“文革”数十年后的聂元梓的言行，使我们进一步认清了她的“人性恶”的本质。

和当年一样，聂元梓惯于将自己的错误上推下卸。书中，她一口咬定：“从法律角度，我没有责任”。企图以法律责任来推卸个人应负的道义责任和领导责任。此中手法，“回忆录”中随手可拾，上推毛泽东、江青、陈伯达、康生、中央文革，下卸新北大公社。只是，麒麟皮下难免露出马脚，“回忆录”的白纸黑字，清楚地暴露了她蓄意陷害学生的恶行。

她本人确认的毛泽东“七·二八召见”的谈话纪录中，纪录了这样一段话：

我（聂元梓）说：“侯汉青（清）在社会上搞了一个反动集团，恶毒攻击主席、林副主席”。

不打自招，不是井冈山兵团一把手、青年学生侯汉清“恶毒”，而是老谋深算的聂“老佛爷”恶毒！聂元梓，借召见之机，背着侯汉清和北大师生，无中生有地对青年学生侯汉清罗织罪名，落井下石，企图借刀杀人，假毛泽东之口，置侯汉清与井冈山兵团数千北大师生于死地。在这里，毛泽东显示了一个老人的精明与仁厚。他没有采信聂元梓的谎言，从而加害侯汉清与“井冈山”。当时，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聂元梓的政治陷害一旦得逞，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将导致多少门庭家破人亡？！聂“老佛爷”的用心何其毒也，她的蛇蝎心肠，于此可见一斑！这种结论，不是别人强加于她的，而是她自我暴露的。她不仅当年如此说如此做，至今居然还腆颜向世人展示，不但暴露了自己的丑行，恶毒之极，也愚蠢之极！

作为一个教师，对学生应该慈善；作为一个母亲，对下辈应该慈爱；这是为人之根本。聂元梓既无善又无爱，何以为人师表，为人母亲？历来入主北大者，上溯严复、蔡元培，后至胡适、马寅初，有谁如此置学生于死地，推之其入火坑？而聂元梓如此大规模如此残酷地迫害学生，于北大绽开了恶之花，这在北大历史上不但是前无古人，恐怕也是后无来者了！今天，聂元梓已步入老迈，上帝给她的时间已经不是太多了！她的忠实助手孙蓬一以顽硬刚愎著称，尚能在临死前向被严重伤害者一一赔礼道歉，甚至下跪认错，而聂元梓何以死不改悔？聂元梓，你决心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吗？你决心将自己的恶名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吗？

二、民主与专制

北京大学有着光荣的传统，是民主、自由、平等精神的圣地。鲁迅先生曾如此概括北大的“校格”，也即北大的精神：“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我观北大》）这种精神，即使在“文革”中依然流布在燕园之中。北大师生员工继“五四”运动，继“五七”鸣放之后，又一次高扬了北大的民主旗帜，向以聂元梓为代表的黑暗势力及其施行的专制暴行，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可歌可泣、艰苦卓绝的抗争。聂元梓在掌权之后，试图使北大统一于她一人之脑、一人之口，试图以封建专制主义钳制北大师生活跃的思想。作为她的批评者，“红联军”“井冈山”等组织，他们没有盲从于校内外的主流观念，能够用自己的头脑进行独立思考，“红联军”中的“虎山行”战斗队便是其中突出的代表。他们因此而遭到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的痛恨。从今天存档的当年“校文革”主办的《新北大》校报33期（1967年2月1日），我们便发现该报刊登了《彻底清除北京大学“红联军”、“井冈山”的别动队——“虎山行”的反革命罪行》一文，全文长达四整版，对“虎山行”声势汹汹，大张挞伐。“虎山行”是什么样的组织呢？它只是数力学系、生物系几个青年学生（杨作森、卞宗美、吴可、刘秉慈、张家瑞等人）的临时组合。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泛滥之下，依然坚持独立思考，自由思想，本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精神，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林彪与中央文革提出了质疑，主张“炮轰中央文革”，“搬开聂元梓”，指出聂元梓等人所谓的“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堕落到赫鲁晓夫的泥坑里去了”。他们坚决反对聂元梓去上海串连炮轰上海市委，主张“解放黑帮”……今天，抹去岁月的烟尘，我们能够看到这些青年学生头脑中明彻晶莹的思想之光，为他们追求真理的大无畏勇气拍手叫好。然而，聂元梓历史地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认定他们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疯狂地攻击诽谤革命左派”，对他们进行了多次惨烈的批斗，把他们定为反革命分子，其中杨作森还被抓捕入狱。

北大真是中国一块民主的圣地，有着民主、自由、平等的光辉传统。纵然有专制、保守思想的阴魂，但从未从能够阻扼民主力量的升腾，自由、平等思想的萌发。北大人往往蔑视人为的偶像和权威，不会盲从于某种时尚的观点和思潮。因而，当聂元梓成了政治暴发户，头脑恶性膨胀，试图在北大大树特树她个人的绝对权威，试图“上上下下，万众一心”，气指颐使。聂元梓横行专制时，势必遭到思想活跃而富有正义感的北大师生的批评。这种批评，本属正常民主生活范畴。然而，聂元梓头脑里没有民主观念，也根本不理解北大的民主传统，倚仗自己有坚硬的后台，得意于炙手可热的政治地位，习惯于“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封建专制逻辑，试图在北大打压批评力量和思想活跃分子，从而使矛盾激化。聂元梓镇压了这些批评者，使北大表面上一度平静，她的江山似乎稳固。但是，她不明白，恰恰是这被批斗和被打成反革命的数百人，在心中种下了仇恨的种子。他们的遭遇，也激起了北大和北京高校广大师生的同情。聂元梓先安内，后攘外，在“摆平”了北大内部的反对派之后，便指派新北大公社到中央各部四处夺权，因此又与部分北京高校师生产生了强烈矛盾。有鉴于此，更加声势浩大的第二次反聂高潮，在北大内外多重作用力下开始出现了。北大井冈山兵团充满活力，在校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此使聂元梓寝食不安，校无宁日。北大两派斗争，已不是当时全国各地盛行的一一所谓对“走资派”的“革”与“保”的问题，而是在所谓红色政权成立之后，更深层的民主对专制的抗争。北大当时的反聂斗争，是在特定社会条件下呈现的特殊社会形态，是北大民主、自由、平等传统的弘扬，是沉沉暗夜中燃烧的富有社会正义感的人性火炬。民主战胜专制黑暗之后便是光明，正如“五四”前夕，鲁迅先生在《随感录》一文中所预言：“无论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潮，什么罪恶来褻渎人道，人类的渴望的完全潜力，总是踏了这些蒺藜向前进。”鲁迅先生讲得多好啊！

当时，聂元梓们口口声声批判北大“右派翻天”。他们所谓的“右派”，便是思想较为活跃

的对极左派聂元梓持批评意见的师生员工，便是富有社会正义感愤而登上“井冈山”的反对派。一边为首的是延安“老革命”聂元梓，一边为首的是“喝美国牛奶长大的”“美国特务”周培源。以我划线，我是“文革”红得发紫的大左派，你们反对我，岂不是道道地地的大右派？聂元梓是“文革”中的一面旗帜，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要推翻这座偶像，在逻辑上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中央文革虽然对聂元梓的政治野心膨胀存有看法，对作为“文革”旗帜与政治工具的需要，对聂又批又保，而基本立场则是保。江青、陈伯达曾多次在批评之后又好言抚慰，明确表态要保聂元梓，康生甚至说：“是乌龟王八蛋，我们也要保。”北大反聂派，对此心知肚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凭的是什么呢？凭的是民主信念，凭的是道德正义，用当时的话语来说，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出于这种信念，反对者不怕压，不怕被打成反革命，甚至不怕生命的危险。聂元梓妄执地认为，凭借强权和强力可以镇压反对派，文斗不行便诉诸武力。然而，她的所作所为，抽刀断水水更流，更加激起众怒，更加不得人心。聂元梓在如此优越的政治优势和如此强大的强权政治下，竟然对在野的反对派无可奈何，可见北大民主精神之顽强了！聂元梓是“文革”中招摇全国的一面旗帜，反聂自然要触动中央文革的政治神经，甚至要撼动“文革”的政治根基，故对聂斗争的意义已不囿于北大，也不囿于北京高校，甚至不囿于北京了！

聂元梓曾是北大哲学系的党总支书记，但她根本不懂得矛盾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则。一个“老革命”却缺乏起码的民主素养，而专制的观念则根深蒂固。她尚未爬上高台时，便想在北大改朝换代，置陆平于死地；她上了台之后，则让人们臣服于她，大树特树她个人的绝对权威，使北大成为她极权统治下的一统天下。北大当时有民谣曰：“每月二十五，展览馆人就受苦！”为什么受苦？每月这一天，人们就要庆贺“五·二五”“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光辉业绩，展览馆的工作人员必须豪华地复制这张大字报。还有一个民谣曰：“老佛爷面前一声‘喳’，赏你一件黄马褂！”“老佛爷”是谁？原是清末专制的慈禧太后，在她面前只有说一不二的奴才才能得到宠信。聂元梓步其后尘，成了现代的新的专制佛爷，并以此名扬京都，名扬全国。

北大是个什么地方？北大是“常为新的”，是常常新思潮汹涌，每每与恶势力进行战斗的地方，聂元梓何德何能，妄图一呼万应，一统北大？北大人的文化自觉和民主精神浃骨入髓，岂容陈旧的专制思想横行霸道？事隔数十年之后，“文革”大潮水落石出，历史真谛已显露无遗。当今的世界，民主的普世价值日益深入人心，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是股逆流。民主潮流，堂堂正正，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们回顾北大这段不寻常的历史，叱咤暗鸣，血火交迸，万千人数年奋不顾身的抗争，岂不让人深思？所谓两派之争，其意义岂只简单的“派性”两字了得？！

三、道德与政治

政者、正也。政治家应是道德高尚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谋求社会正义、亲民、爱民、为民为己任。与之不同的则是那些政治掮客，试图以权术驱使民众，玩弄政治，从而也被政治所玩弄。聂元梓便是这样可恨可悲的政治掮客。

聂元梓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人。北大“社教”运动，为聂元梓的政治表演提供了一个舞台。她忘恩负义，不顾陆平对她的关照和重用（她之所以调进北大，是出于陆平与其哥哥人大副校长聂真的私交，拯救她于困难之际。聂元梓到北大后，在经济系当了三年副主任，即升任哲学系总支书记），向北大“社教”工作队队长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肆意诬陷北大党委“烂掉了”，“要换班子”，调门极左，言辞激烈，从而成为工作队宠信的北大头号“社教”积极分子。张磐石在北大的路线被中央否定后，聂元梓又痛哭流涕做检查，承认自己犯了严重的错误。这种朝三暮四的投机行为，为一些北大“社教”积极分子所鄙视。故“社教”积极分子（后为曹轶欧工作组成员）张恩慈闻知让聂元梓带头签署第一张大字报之后，扼腕跌足，连连责怪其他同志，怎么让她牵头署名？可见，北大“社教”运动的反复，人们已初步认清了聂元梓的个人品质。

“社教”运动之后，聂元梓一度彷徨无依，便经常活动于高干门下，企图在政治上寻求出路。后来，她认识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吴溉之，虽然聂小吴二十四岁，但为了在政治上找到靠山，便以聂调出北大给吴当秘书为条件嫁吴为妻。吴溉之“人很老实”（“回忆录”94页），对聂呵护有加。然而，“文革”初期，吴溉之即被打倒，聂元梓为了显示自己的革命，要与吴溉之划清界限，便与吴分居。1966年末，吴溉之的两个上大学的子女到北大向聂索要个人贵重物品。聂找到时任北京大学红卫兵司令的法律系学生牛辉林，声称周恩来、康生要管教吴溉之的子女，要求牛辉林带红卫兵押送他们到中南海交给周恩来和康生。牛辉林带队押送吴的两个子女到中南海却不见有人接应。聂元梓便亲自出面深夜领路，让牛辉林带领红卫兵押送吴的两个子女去抄吴的家。聂元梓从小车车窗口指着胡同一侧亮着灯的门楼说：“这就是彭、黄分子，大黑帮吴溉之的家！”但是在“回忆录”中，聂元梓却颠倒黑白，捏造事实，谓牛辉林逼迫她引领抄家。只有鬼才会相信，当时红得发紫的聂元梓，在北大有人能够逼她就范？书中她还说道：“我连汽车都没下去——我心中那个乱啊”，真是虚伪之极！后来，她出于政治需要还是与吴溉之离了婚，为个人的第二次婚姻打上了句号。出乎聂元梓的意料，牛辉林和同学们不但没有抄家，反而和吴溉之一家成了朋友。牛辉林通过吴溉之的述说，了解了聂元梓的为人，从而反戈，与其他抄家同学一起，成了聂的坚定的反对派。

聂元梓是一个不学而有术的人，其“术”非学术，而是权术。她长于投机钻营，惯于趋炎附势；善于上推下卸，文过饰非；经常出尔反尔，颠倒黑白……“文革”运动曲折环回，跌宕起伏，在动荡之中，使一些耍权弄术者的本来面目暴露无遗，处于风口浪尖上的聂元梓，更让人一览无余。她凭借与吴溉之的特殊关系，看到了中央的一些绝密文件，很早就知道中央对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的态度，因而在大字报上署了头名，取得了第一次政治投机的成功。后来，她又察颜观色，看到了邓小平在“文革”中的政治危机，于1966年11月8日，带头贴出了一张名叫《邓小平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所谓“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企图进行第二次政治投机；之后，又组织人刷大标语，写大批判文章，企图打倒“大军阀”朱德；她也曾派人到湖南湘江风雷处，收集诬陷周恩来的一份所谓007密令材料上交戚本禹。她还让自己的心腹，组织所谓第二战斗队，秘密收集许多老干部的黑材料，致使许多干部因此受害……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戚本禹一度政治上走红，她便紧跟紧靠。她们先后倒了台，她便摇身一变，把自己装扮成曾经与之斗争的“英雄”。在1970年庐山会议上，她紧跟林彪、陈伯达，上窜下跳，制造要设国家主席的舆论。陈伯达倒了台，她失去靠山，又给康生写信表忠心。更为老奸巨滑的康生，又怎能被聂元梓的小权术所蒙骗，在她给他的信封上批了这么几个字：“请看这个两面派”，便将此信退给了北大军宣队。

聂元梓曾靠政治权术走红，但政治权术可以走红一时，但不能走红一世，并且常常因此自作自受，反受其害。她曾带头攻击邓小平并株连其子女。1968年5月底，校文革编造了一份《邓小平通过邓朴方组织反革命集团，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控制北大运动》的绝密报告，递交给江青。又经聂元梓亲自批准，指使人绑架了邓朴方、邓楠，逼他们交代“邓小平是如何反对江青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并给他们扣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致使邓朴方高位截瘫，终身残废。在聂元梓撰写回忆录期间，邓小平的政治威望如日中天，于是，聂元梓，便闭口不谈他的反邓“光荣历史”，摇身一变，倒成了邓朴方的守护神。这种永不认错，永远正确的姿态，只能表明了她可笑可耻的奸诈与愚蠢。她自欺欺人，而今著书欺世，却适得其反，更加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

她是北大武斗的始作俑者，是组织武斗的总策划人。可是，在这本书中，它却歪曲历史事实，把北大挑起“3.29”武斗的罪孽嫁祸与人，不但如此，还恶意诬陷有人用匕首刺杀她。

这真是弥天大谎！

事实是这样的：

1968年3月29日凌晨，头戴柳条帽，手持长矛的新北大公社武斗队，突然袭击化学系男生居住的31楼，酣梦中惊醒的“井冈山”学生手无寸铁，无力自卫，使得一些人被长矛刺伤，也有一些人因跳楼逃生而致伤，新北大公社武斗队随即占领了31楼。他们一时志满意得，声称这一仗“打出了威风”、“打出了大好局面”。

早晨，武斗现场，一片狼籍，聂元梓陪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俨然以超然局外的领导者身份前来视察，并伪善地大唱“要文斗，不要武斗”的高调。聂元梓贼喊捉贼的行径，极大地激怒了北大的师生，人们一拥而上，包围了他们，与之辩理。化学系学生“井冈山”派的樊能廷，一时未能抑制住心头怒火，随手用手中的改锥捅向了聂元梓，致使她的头部破皮。这便是聂元梓大做文章，夸大其词，所谓的有人“用匕首行刺”她的事件的前因后果。

聂元梓挑动了武斗，挑起了仇恨，又转而栽赃诬陷。此种恶劣行径，使许多亲历者为之切齿咬牙。一个青年学生，一时冲动，伤了聂的皮肉；而聂元梓两面三刀的政治伎俩，则刺伤了人们的心。聂元梓耍弄政治权术，大打悲情牌，一度对“井冈山”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压力，但深知真相的人们，则更为义愤填膺，与聂元梓的矛盾更为激化。

她还在武斗期间，凭借自身的强势力量，四处派人抓捕不在学校的“井冈山”骨干，到校进行严刑拷打，大搞逼供信；又利用在位的权力，在毕业分配、助学金等问题上施压，迫使一些“井冈山”人声明“下山”。她居然以此向毛泽东邀功，谓许多人“造反下山”，想给毛泽东一个错觉，“井冈山”不得人心，岌岌可危。毛泽东并未上当受骗，他深知个中原由，回答是：他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四两拨千斤，化解了聂元梓的政治权谋。

聂元梓这个“老革命”，企图玩政治与股掌之中。但是她的政治，不是正义之道，仁厚之道，而是奸诈之术，邪恶之术。大道之行，则众人皆服；权术行矣，则众叛亲离。她视北大师生如阿斗，以为玩弄一些小伎俩，便可瞒天过海，真是小看了北大人的智商！她亦曾一度蒙蔽了高层政治人物，但后来极少有人肯定她，信赖她。1973年7月17日，毛泽东在接见杨振宁时，便义正词严地说：“聂元梓这一派太坏了！”周恩来亦对即将访问北大的外宾说：“北大有一个最坏最坏的女人！”这里，周恩来虽然没有直指其名，只是，我们要说：在北大除了聂元梓，又有谁有资格担此美誉佳名呢？“自作孽，不可活”，这种政治与道德天平的严重失衡，使她不但在政治上灭绝，并使后来的个人生活伶仃落魄，长期四处彷徨，无枝可栖。“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一切独裁专制者，所有企图玩弄权术，玩弄群众的政客，都不会有好下场。聂元梓，你忏悔吧！

四、历史与未来

聂元梓曾在法庭中被刑之以法，作为一个政治囚犯，而在监狱中服刑。然而，她始终没有认罪服判，企图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进行翻案，撰写此部“回忆录”，便是在混淆视听，歪曲事实，企图蒙骗不明真相的后来人，以达到其在政治、法律、思想道德上翻案的目的。然而，他没有想到，恰恰是这部“回忆录”为我们的民间法庭，对她的思想道德审判，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使我们能够在法律武器之外，拿起思想道德的法锤，进行一次民间的正义审判。

聂元梓在“回忆录”的《自序》中曾虚伪地表示：“我还要向那些我在文革中犯错误而造成痛苦的人致以深切的歉意和忏悔”。

聂元梓忏悔了吗？

沈达力、刘玮、殷文杰、温家驹的幽魂在回答：“你没有忏悔！”

被迫致残的邓朴方、樊立勤、韩琴英、彭秋和以及成千上百身心受到伤害的北大师生在回答：你没有忏悔！

聂元梓在《自序》中还说道：“我只希望说真话，让历史恢复它本来的面目”。

说真话了吗？

没有，没有！

她在许多地方混淆黑白，颠倒是非，企图搅混历史，蒙骗后来者。她尤其逃避了要害问题，即残酷地镇压对其持不同政见者的北大广大师生。她不是说：“让历史恢复本来面目”吗？那么，让我们看看，它是如何亲口在大庭广众之中，承认书中逃避的要害问题：

在1969年6月29日，聂元梓在全校“三忠于”讲用会上，承认她支持武斗、指挥武斗等问题，说：我利用职权，批准制造土枪、土炮、土手榴弹、土坦克，甚至派人搞枪支，为武斗升级做准备。为摧垮井冈山，（我）大抓反动小集团，扣押工资、助学金，甚至断电、断粮，往28楼里灌水……还随意抓人、审讯，搞逼供信，打死人。（《北京大学纪事》681页）

作为当年北大的官方组织，北大工军宣队也曾严肃地对北大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作了如是评语：

工军宣队领导小组向市革委会上报，名为《发动群众总结经验，团结起来落实政策》的工作报告。这份文件说：校文革实行“亲我则亲，冷我则冷，打我则打，反我则反”的原则，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政策。它后期变成了一派掌权的派文革，武斗文革、逼供信文革，把大批师生员工打成反革命。（同上书上页）

上述可见，聂元梓的自供与当时官方组织对北大“文革”的结论是基本一致的。聂在确凿的事实和众目睽睽的万千北大师生面前，不得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这种承认，是一种进步，应予肯定。可是，事隔数十年之后，口口声声要说真话的聂元梓却逃避要害，企图不认帐了。她打错了算盘，以为逃避要害，要害便不存在了，自己不承认，人们便知道了。她妄执地以为，历史是可以任人摆布的小姑娘。然而，北大历史的见证人大多仍然健在，言之凿凿的史料亦大多存在，这个铁案又怎么能推翻得了？经过数十年世事的磨洗，聂元梓的心灵理应淘洗得干净些，让人性渐渐回归，以求得人们的原谅和自身的安宁。然而我们遗憾地看到，她在书中仍然咬牙切齿地扬言，自己“人还在，心更未死”。她借用“让历史告诉未来”这句话作为《自序》的题目，清楚地表明她写此书的目的，便是篡改自身不光彩的历史而在未来的殿堂里彩塑自身，便是妄图用假历史来蒙骗未来。所以我们说：这本书是地地道道的翻供状。聂元梓的言行，向我们清楚地表明，聂元梓依然是当年的聂元梓，是一个依仗强权滥用暴力的专制者，是一个惯于作伪的话语霸权人，一个与民主潮流背道而行的飘零者，将无可挽回地走向伶仃孤独的人生末路。

客观地讲，“文革”造就了聂元梓，也坑害了聂元梓，她也是一个受害者。在当时风云变幻，充满变数的政治环境中，作为一个政治工具，一根棍子，她极易犯错误。只是，犯错误有两种，一是被动的，身不由己的；二是主动的、可以避免的。犯错误的人也有两种：一是好人犯错误，

二是恶人犯错误。聂元梓的错误，除了身不由己之外，更多的是主动所犯的错误，是恶人的恶行，其突出表现，便是政客式的两面三刀，便是“老佛爷”式的对群众的专制横暴。她作为政治暴发户，一时的得势，使其头脑恶性膨胀，身上潜在的劣性品质被宏扬涨大，从而罪行累累，成为当时许多人所诅咒的一个坏女人。人们是宽容的，历史也是宽容的，时过境迁，如果她能沉潜下来，好好地洗心革面，梳理过往历史，深入反思和忏悔，也澄清一些历史真相，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是会宽恕她的。

然而，她没有进步，她依然故我，依然是当年的聂元梓！

她企图翻供，却越描越黑，自相矛盾，漏洞百出，旧问题上又添了新故事！

她没有改恶从善，立地成佛；没有幡然悔悟，痛改自身的价值法则；不是以人为本，以人权、人道、人性为普世价值、核心价值、终身价值，而依然执迷权术、伎俩、权谋的政治 掮客的惯常思维。她未能跳出文革烟云，站在历史的云端，去分析和评价自身的历史定位；而是换新瓶装旧酒，贴上新标签，企图在天真善良的人们面前兜售文革陈酿。她愚蠢地以为历史便这样可以改变了，未来属于她的了！殊不知任意涂脂抹粉的脸面愈来愈丑，她错过了改恶从善的历史机遇，她也必然丧失未来。

聂元梓的败局已定，但她仍不甘心，还想玩弄一次政治伎俩，放出胜负手，拼尽历史老本去赌博未来。虽然政治态势，常常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但是，人类道德，却具有普遍性、恒久性。当今世界，人权、人道、人性的民主法则和正义良善的道德律，犹如日月经天，江河纬地，为整个人类所敬畏和崇奉。聂元梓紧抱着封建专制的衣钵，以专制手段和权术为护身法宝，愈到后来，愈让人们所不耻和嘲笑。当年曾树她为“文革”旗帜的毛泽东主席，开始确曾多方支持她，庇护她，但在后来，他的道德法眼也看透了聂元梓的品质，知道看错了人，用错了人，从此弃之如敝屣。“文革”中的毛泽东尚且如此，则后人对聂元梓更能冷眼看破！

世界在日益进步，人类的价值观念、思想道德在不断提升。
君不见，民主潮流如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吕后、慈禧皆尘土，今天的绞刑架上高悬专制者萨达姆！
专制政客聂元梓翻案必败，未来决不属于她！
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

## 【研究报告】

### 四五运动的背景：七次冲击波

• 陈子明 •

中共党内干部对毛泽东的信仰崇拜，在1956年达到最高峰；中国普通民众和青少年一代对毛泽东的信仰崇拜，在1966年达到最高峰。这一方面是党外群众对“三面红旗”运动破产的真相了解较少，一方面是底层民众比较容易受到民族主义的感染，当时他们正为毛泽东成为“世界反帝反修的领袖”、“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而欢欣鼓舞。毛泽东机敏地利用了这一落差，适时地开展了“文化大革命”，借助党外群众来巩固自己在党内业已动摇的地位。

“文革”开始后，作为运动主要对象的高干阶层，对毛泽东的信仰崇拜迅速降至冰点；由他们的子女所组成的“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联动）”，到1966年底的时候，已经对毛泽

东和林彪的路线持明确的批判态度。“联动” 0 0 3 号通告“号召各省市革命干部子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忠于马列主义和一九六〇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二个主席，几个委员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普通民众和青年对毛泽东信仰的破灭要滞后一些，但是到四五运动爆发时，已经与干部阶层大体上同步了，其中一小部分人非毛化的深度与广度，则远远超过了高干阶层及其子女。

对毛泽东及其主义的信仰，在“文革”中先后受到七次大的冲击波，我们分别称之为刘少奇冲击波、杨曦光冲击波、陈伯达冲击波、林彪冲击波、尼克松冲击波、邓小平冲击波和周恩来冲击波。四五运动的爆发，固然有其偶然的因素，即周恩来的去世，但也有其深远的思想背景，有一个水滴石穿、水到渠成的孕育发展过程。胡耀邦曾说：“从1969年到1976年以前，表面上看来好像风平浪静了。实际上在底下、在人民的心中和私下交往中，真是波浪滚滚、汹涌澎湃。接着就爆发了‘四·五’天安门广场群众革命运动，为‘四人帮’倒台奠定了最伟大的群众基础。”

#### ◇ 刘少奇冲击波

在“文革”中，毛泽东企图用“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两个司令部的划分来区别他自己和刘少奇。其实，要把毛刘彻底分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自1943年成立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的中央书记处之后，中共的党务和组织部门就一直控制在刘少奇的手里。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除了肯定毛泽东的路线外，惟一受到表彰的人就是刘少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然刘少奇和毛泽东屡有意见的不同，但只要毛泽东最后拍板，就由刘少奇去负责组织实施。因此，如果全面否定刘少奇路线，就必然要全面否定过去的十七年。事实上，除了林彪直接领导的军事领域，文艺部门、宣传部门、教育部门、工业部门……后来陆续被确认是“黑线”占据了统治地位。

这样一来，对刘少奇路线的批判就变成了对“文革”前的方针政策的重新审视和全面检讨。中共十七年统治中的黑暗面，就在广大群众中陆续曝光。尤其使城里的青少年感到震惊的，是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大规模的饥饿和非正常死亡。举个例子来说，学校工友对于当时靠捡拾菜帮和树叶维持一家生计的回忆和对校领导拒绝提供生活补助的控诉，是导致当时十四岁的笔者义愤填膺地卷进“揪黑帮”斗争的直接原因。对邓子恢、陈云、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批判也被重新翻腾了出来，但是，当被批判者和批判者的文本同时摊在桌面上的时候，很多人发现前者比后者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邓陈彭张等人比毛泽东更加了解经济的实际情况，更加关心人民的生活疾苦。

由于十七年与毛泽东自身割不断的关系，他不能仅仅依据刘少奇在此期间的所作所为来彻底打倒他，因此，毛泽东、江青一伙最终是以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将刘少奇置于死地。但是这样一来，反而弄巧成拙。如果在历史关键时刻（1945年8月至1946年3月）担任中共代理主席的刘少奇真的是“叛徒、内奸、工贼”，而且党内还有一个以他为首的“叛徒集团”（包括当时担任中共东北局书记的彭真，担任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的薄一波，担任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的刘澜涛等人），中共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赢得内战胜利就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上述罪名只能说服毛泽东自己，而完全说服不了党内外群众，只是印证了林彪鼓吹的“权力哲学”，彻底败坏了毛泽东和中共的诚信。

#### ◇ 杨曦光冲击波

杨曦光即杨小凯（1948—2004），“文革”中《中国向何处去？》一文的作者，去世前是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教授、澳大利亚国家科学院院士。在这里，我们把他作为“文革”

中“新思潮”的代表人物。

“文革”初期，马克思“怀疑一切”的格言曾经在红卫兵和造反派中风行一时。其中政治上最敏感的人不再满足于路线批判，而进一步深入到制度批判。与此同时，“无产阶级司令部”在当时的号令也给他们指出了这样一个方向。毛泽东在1966年6月1日的批示中称，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北京公社宣言”，比巴黎公社意义更重大。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宣布：“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产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林彪1966年11月3日《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大民主的新经验，就是党无所畏惧地让广大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形式，批评与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同时，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

杨曦光的文章名气最大，但并不是“新思潮”的最早文献。1966年8月30日，北京大学东语系学生乔秉武（原名乔俊礼）和杜文革（原名杜文忠）贴出大字报《给党中央毛主席国务院的公开信：造三个大反——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世界，创建新世界》。他们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条件下，适用于以前的党团组织形式已经完全失去了它们继续存在下去的意义，成了妨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旧的组织形式。党团领导政府，而党外群众对党的各级组织没有选举权，不能实行监督，容易产生修正主义、官僚主义。他们建议：第一，“取缔党团组织，代之以革命委员会”，实行巴黎公社式的全面选举制；第二，“党政合一”，党政两套组织形式造成浪费，应当废止，由革命委员会完全地承担革命和建设的任务；第三，“砸烂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切办公室”。

1966年10月17日，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学生李文博贴出大字报《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的国家了》，不久，他又和其他学生一起提出大字报《大大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大大革新社会主义制度》。李文博提出：“我们现在的制度……是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仍然是产生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官僚主义的温床、社会条件。”“新思潮就是要大大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大大革新社会主义制度……打掉一切国家机构的组织形式，创立新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样式。”笔者当年曾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亲眼目睹《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的国家了》的大字报以及写在上面的大量批语，思想受到强烈的冲击，感觉到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理论探讨。

1967年10—11月，杨曦光写了《关于建立毛泽东主义小组的建议》和《长沙知识青年考察报告》。1968年1月8日，杨曦光完成了《中国向何处去？》，此文很快在全国范围内流传开来，周恩来、康生等曾亲自出马点名批判。杨曦光认为：“中国社会形成了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中国现存的政权形式基本上是官僚机构，掌握官僚机构的特权阶层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座山。他们通过城市剥削农村来塞满自己的腰包，他们的高薪就是工农和知青的血汗。”“文化大革命”是“广大人民群众与特权阶层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的产物，它不应当是“罢官革命”、“揪人运动”，其目标应当是“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革命”，“建立类似巴黎公社的没有官僚的新社会——‘中华人民公社’”。

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新思潮”的封杀表明，“文化大革命”就是“罢官革命”、“揪人运动”而已，不过是在旧制度框架内对“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而新权贵上台后，表现得比老权贵更贪婪，更无耻，广大群众面对特权仍然是束手无策。这使“文革”中一批积极、最活跃、最肯动脑筋的参与者理想破灭，成为最早否定“文革”及其发动者的一群人。

◇ 陈伯达冲击波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抛出了陈伯达，随后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批陈整风”，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当时扣在陈伯达头上的帽子包括“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天才论、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其中最引起关注的是“唯生产力论”。

陈伯达虽然长期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并在“文革”中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但他的思想和毛泽东、江青、张春桥等人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在“文革”爆发前一年的1965年，他曾热衷于电子化，说“电子化是不亚于蒸汽机的又一场划时代的工业革命，世界先进国家都在搞，我们不能落后”；还主张把列宁的公式“共产主义等于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中的电气化改为电子化；鼓吹发展工业要以“电子为中心”。1969年春天陈伯达受命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时，将题目定为《为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认为今后工作重点应当从“抓革命”转移到“促生产”上来。他在与张春桥讨论稿子时说：“还是要发展生产，搞好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能尽搞运动、运动，像伯恩斯坦说的：运动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张春秋反驳陈伯达的劈头第一句话：“你说的是唯生产力论……。”陈伯达辛辛苦苦起草的报告稿，支持张春桥的毛泽东连信封都没有拆开就退了回来。1970年9月16日，从庐山回京后的毛泽东对汪东兴说：“我们的任务是对付帝、修、反。而陈伯达不管帝、修、反。”

毛泽东对陈伯达的批判，使那些期盼通过“抓革命”手段实现“促生产”目标的人大失所望。笔者在1969—1970年那个冬季曾出席内蒙阿巴嘎旗“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讲用稿中包括以下内容：自己刚刚下乡时曾找寻阶级斗争的现实表现形式，却发现“四类分子”各个都是生产中的骨干，因而一度怀疑阶级斗争的理论，后来才发现，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情况下，人们普遍缺乏生产积极性，必须辅之以对一小部分人的斗争，才能刺激和推动生产，正所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因此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实质上是一种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手段——可以概括为“阶级斗争工具论”。批判陈伯达的“唯生产力论”，使我感到毛泽东心目中只有他自己曾说过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项社会实践中的一项，即“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而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实现现代化毫无兴趣。

毛泽东发动批陈运动，给许多人带来一个意外的收获。在“文革”初期，林彪曾提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经典著作中，我们要99%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当时北京农业大学附属中学学生“伊林·涤西”（原名刘握中和张立才）写大字报批驳，被打成反革命。此后很长一个时期里，连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也是一件犯忌讳的事。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的闭幕会议上说：“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呀，就照着吹呀，那么，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十几本。”还“要读几本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他的本意是针对陈伯达的“天才论”、“唯生产力论”，却为广大干部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开了绿灯。学习的结果是，人们更加认识到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于是，马列著作在许多人那里变成了非毛化的思想武器。

#### ◇ 林彪冲击波

林彪冲击波，对于毛泽东神像的坍塌，是具有决定性的一击。“文化大革命”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如果说不能在之后的经济大发展中弥补回来，那么惟一的收获就是解决了政治继承问题，用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取代了“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但是出乎绝大多数人的意外，“亲密战友”却要“抢班夺权”，谋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最后导致了自己一家子的“折戟沉沙”。“李一哲”（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和郭鸿志的共同笔名）中的陈一阳当时致信王希哲，反对他“林彪从来就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的提法，“认为如果今天我们还停留在当年那样，把一部分人先天地划为‘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一部分则‘从来也不是’，那就太形而上学了。我们应该研究的是，林的一套为什么过

去得到毛主席的欣赏，后来又是怎样与中国革命的实践发生冲突的”。这样一来，对林彪的批判就指向了非毛化。

为了挽回毛泽东的威信，并说明与林彪集团斗争的必要性，向干部群众传达了《毛泽东给江青的一封信》和《“571”工程纪要》。然而，这两份材料在事实上却成为“文革”期间传播最广泛、震动最强烈的非毛化宣传品。

据说是写于1966年7月8日的《毛泽东给江青的信》称：“我的朋友”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读过这封信的人，凡是多少有点思考能力的，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不是毛泽东当了替林彪捉鬼的钟馗，而是林彪当了替毛泽东捉鬼的钟馗。钟馗还算是个正面人物，林彪却被卸磨杀驴，成了死无葬身之地的冤大头。有些人不相信这封信的真实性，认为是事后的伪作；相信其真实性的人，则更加看清了毛氏厚黑学的欺诈性和无耻性，即使最亲密的战友，也只是用过就可以丢掉的政治工具。

由林彪儿子林立果手下“小舰队”成员于新野执笔起草的《“571”工程纪要》，是一篇讨伐毛泽东的檄文。《纪要》指出：“他（指毛泽东）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他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变成封建独裁专制式的家长制生活。”“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充当炮灰，后期被压迫，变成替罪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他们所谓打击一小撮，不过是每次集中火力打击一批，各个击破。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最大倡导者。”《纪要》所提出的“动员群众的口号”是：“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指毛泽东），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建立一个真正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笔者当时看到这个材料，感到非常过瘾，因为它说出了自己想说而不能说的话。

据胡平回忆，他在看到上述两个材料后，曾写诗一首，以表达自己的内心感慨：“惜乎不中秦皇帝，毕竟渔阳鼙鼓来。纵有家书欺海内，奈何神像落尘埃。”胡平的诗反映了当时相当一批有思想的青年的共同心声。

#### ◇ 尼克松冲击波

尼克松冲击波与林彪冲击波接踵而来。尼克松曾把自己的首次访华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这种改变决不限于中美两个大国的外交战略和世界格局的改变。从事后来看，尼克松访华的最大意义是启动了中国内部的“和平演变”。

尼克松在与毛泽东见面时先说了一些奉承话。他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毛回答说：“我没有能够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这种貌似谦虚的话，仍然过高估计了他在当时中国人心目中的位置。事实上，“文化大革命”转了一个圈子，已经回到了出发点，当时毛泽东的处境甚至还不如运动发动前的情形，因为群众和青年对他的

信仰已经基本破灭。这时，受到林彪冲击波强烈震撼的国人已经不再期待从毛的著作和最新指示中找寻解决中国问题的钥匙了，而尼克松的访华，恰逢其时地给他们打开了面向世界寻求新知的一扇窗户。

在1970年代，“美国之音”成为中国青年获取新知的重要途径。笔者一位朋友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草原地广人辟，天高皇帝远，蒙族干部，言语不通，难做‘政治思想工作’，竟对知青播放的美国之音开始曲‘扬基歌’大加赞赏，连连夸奖这一乐曲的动听。不知是哪个知青，还将诸如‘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之类的词加入曲中，唱给不断追问的牧民听，逗得知青们捧腹大笑。”事实上，不仅是内蒙牧区的知识青年收听“美国之音”，其他省区的知识青年普遍收听“美国之音”等所谓的“敌台”。林彪事件后收听“敌台”的普及化，一方面是因为人们感到从官方渠道得不到真实的信息（“敌台”是不少人获得林彪摔死消息的源头），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这个时候“阶级斗争”的弦已经绷得不像1960年代后期那么紧了，大多数人已经患有严重的运动疲劳症。

尼克松访华后，中国以“内部发行”的方式翻译出版了尼克松的《六次危机》，基辛格的《选择的必要》，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等一批当代美国政治历史著作，给有机会读到它们的中国人带来一种全新的感受。笔者就因为在和朋友的通信中谈了一些对基辛格《选择的必要》的读后感而被捕入狱。我们在通信中谈到：在历史发展的关节点上，正确的选择非常重要，如果认为在人们的活动之外，还存在着不可知晓的“规律”，则无异于承认冥冥之中有上天的意志在做安排；当时一些领导人，自称顺应了某种规律，不过是封建制度下“君权神授”论的翻版。在这个时候，我们已经认识到，毛泽东以及中共确立在中国的统治地位，不过是风云际会的偶然结果，并不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法性（正当性）。

#### ◇ 邓小平冲击波

林彪“折戟沉沙”后，毛泽东选择了工人出身的王洪文作为他的新接班人。1972年9月，王洪文从上海调至中央工作。1973年8月，毛泽东决定由王洪文担任“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等任副主任。在同月召开的中共“十大”上，王洪文当选副主席（党内排名第三，仅次于毛泽东、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曾让王洪文读《后汉书》的《刘盆子传》，要他以史为鉴。但事实证明，王洪文就是个扶不起来的刘盆子。1974年，毛泽东两次告诫王洪文不要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搞“四人小宗派”、“上海帮”。1975年1月，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增选邓小平担任副主席。此后，便由邓小平取代王洪文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则被发配到上海“蹲点”——“调查研究”、“帮助工作”。

邓小平主持工作后，雷厉风行地开展各条战线的整顿，狠抓生产和交通秩序的恢复。地方上，大刀阔斧地调整“软、懒、散”的领导班子；在军队，则把“肿、散、骄、奢、惰”作为整顿的重点。在邓小平进言后，毛泽东表态：“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党的文艺政策应当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到1975年7、8、9三个月，很多人感到欢欣鼓舞，认为纠正“文革”左倾错误，调整经济政策和文艺政策，“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颇有希望的。

但是好景不长。1975年“十一”前后，毛远新、李先念在毛泽东面前告邓小平的状，说今年以来“感到有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最近有一些讲话”“味道不对，似乎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要毛远新找邓小平谈一次话，这次话谈崩了，毛远新当面指责邓小平：“你就是修正主义！”此后，毛泽东让政治局开会统一认识，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肯定“文革”的书面决议。邓小平拒绝了，他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由我写这个决议不合适。”毛泽东便以邓小平转送刘冰告迟群、谢静宜状的信为突破口，于11月初首先在清

华大学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然后于同月底召开“打招呼”会，把运动推广到全国。

1976年2月初，中共中央通知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转达到党内外群众，3月初，又下发了《毛主席重要指示》。毛泽东点名批评了邓小平，说：“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又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他还曾对华国锋、王洪文、江青、王海容等人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毛泽东把“文革”作为他毕生的两大业绩之一，为了保卫“文革”的成果，不惜再次打倒邓小平，在党内重新洗牌。这样，在“批邓”之后，党内外干部群众都已经非常明了，指望由毛泽东自己纠正错误是不可能的了，要使中国摆脱困境，只有义无反顾地实行非毛化不可了。

#### ◇ 周恩来冲击波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毛泽东和“四人帮”一伙在周逝世后的所作所为，激起了民众的强烈愤怒，成为四五运动的直接诱因。

1月9日，新华社请示周恩来逝世报道事宜，姚文元答复：“悼词尚未发表，现在不组织。悼词发表后是不是组织反映，仍应再请示。”在他的禁令下，周恩来逝世后的六天里，新华社只发了两条有领导人参加悼念活动的消息。姚文元敢于这样做，是由毛泽东直接授意的。在周恩来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所有的人都神情悲痛，惟独江青，不但不行脱帽礼，志哀时甚至还左顾右盼、东张西望。在全国许多地方和单位，不准群众戴黑纱，不准送花圈，不准设灵堂，不准开追悼会，不准挂周恩来遗像，甚至不准个人家里挂周恩来的遗像和戴黑纱。11日，首都百万群众在街头为周恩来灵车送行，新华社记者写成长篇报道，先是被压缩到很少的字数，最后由姚文元下令，一字也不准报道。13日，姚文元在一天之内三次向新华社下达指示。指示之一：“不要因为刊登悼念总理的活动把日常抓革命促生产的报道挤掉了”；之二：“这几天报纸登唁电数量多，太集中，并且刊登在第一版上。”“唁电版面往后放，从三版四版开始。”之三：“学生化悲痛为力量反击右倾翻案风，在消息中要反映出来。”根据姚文元的指示，14日的《人民日报》在显要位置刊登《大辩论带来大变化》，文章第一句就说：“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这显然是在强奸民意。

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心情，可从当时是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的周为民的回忆中见到一斑。他写道：“噩耗传来，全国一片哀乐声，中国人民不仅为他们热爱的总理离去而悲伤，更为在这‘反击右倾翻案’如火如荼地展开，邓小平受到的批判越来越严厉，人们为邓小平被再次打倒后的国家的前途命运而忧伤。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环境下，人们无法正常表达自己的观点意见，人们不约而同地以悼念周总理逝世婉转表达他们的政治取向和立场。……四人帮当然意识到全民悼念周总理背后的情绪，因此迟群、谢静宜在清华下达了限制悼念活动，不要让悼念活动干扰了‘反击右倾翻案’运动的大方向的限制令。当时在迟、谢关系密切的小圈子里，他们对周恩来总理的不敬也是有恃无恐的。一月十一日晚上，我所在的无三一班全班从清华园步行将花圈送到天安门广场，系党委领导来阻扰劝说我们不要去，我们责问他‘你对总理是什么感情？’他不敢正面回答，借说要请示校领导溜走了。我们的队伍到校门口时，校党委一位副书记电话打到门卫要我们班党支部书记接听，当时我们班党支部书记正在劝大家回去，我就接过了电话。校党委副书记以为我就是班党支部书记就要我劝大家不要去。我放下电话后告诉班党支部书记说校党委同意我们去。这才得以放行。后来我的‘假传圣旨’的行为也受到

追究。……在一月份悼念活动中积极的班事后都受到了批评。水利系给迟群贴大字报的班被他诬蔑为‘小裴多菲俱乐部’，班党支部书记、副书记都被撤换。我们班也成为了校保卫部关注的重点，上了黑名单。”

陈毅逝世后，毛泽东曾参加他的追悼会，因此，人们普遍认为毛泽东会亲自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可是，人们不仅没有见到毛泽东参加追悼会志哀，反而听说他放鞭炮庆贺。1月16日，姚文元砍掉了新华社原定要发表的群众悼念周恩来活动的综合报道。28日，江青扣压了纪录影片《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3月5日，上海《文汇报》在刊登新华社一篇纪念和学习雷锋的新闻稿时，将原稿中周恩来为雷锋的题词全部删去。25日，该报发表题为《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文章，用“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影射周恩来和邓小平。愤怒的群众在数日之内，从全国各地发向《文汇报》的抗议信件和电报达421件，打去的抗议质问电话达一千多次。

周恩来从1920年代后期起，就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之一，但是他与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刘少奇等不同，他从来不是一条政治路线的制定者和代表人物。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周恩来是毛泽东的忠实助手，一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作为“文革”前政治局常委中的惟一幸存者，在动乱时期竭尽全力支撑着中国的经济和外交工作；而且，他无儿无女，与元配邓颖超相敬如宾，生活朴素，为人谦和，道德形象远胜同侪。本来，对毛泽东已经完全失望的人多多少少还对周恩来抱有一些好感，现在，毛泽东及其亲信连周恩来也不肯放过，使人们感到执政集团里已经是“洪洞县里没好人”了。于是，群众性的抗议活动首先在南京爆发，很快就蔓延到北京和全国各地。

~~~~~

【当事者说】

北京市抓“五一六”的情况

• 吴 德 •

“文化大革命”中许多事情起的时候急，收的时候疾，跟不上挨批，跟上了又错了，又挨批。

北京市抓“五一六”的情况也这样。北京市的革委会筹备时，把原来的老市委、新市委的人统统放下了。进来的人基本上都是“王、关、戚”那一派的，主要是学部的人；还有学生，“五大领袖”；还有工人，如刘锡昌、鲁文阁等。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后，基本控制在中央文革小组手里，戚本禹在抓。有一种说法，不知是不是真实：开始成立革委会时，戚本禹要当革委会的主任，直接抓了很多事，革委会的成员很多都是戚本禹的人。听说毛主席不同意。谢富治任“革筹”小组组长以及任革委会主任后，一方面积极向中央文革小组靠拢，另一方面又与他们有矛盾。周景方是市革委的秘书长，曾几次给戚本禹、中央文革小组写信感谢富治的状，说谢富治阻碍发动群众。

革委会中很多戚本禹的人，想把谢富治架空，所以才出现了保谢的一派和反谢的一派。保谢的这一派叫“地派”，还是戚本禹抓的一派；反谢的一派叫“天派”，是聂元梓抓的。我们当时知道，这两派都是中央文革小组在背后直接操纵的。

1967年8月底，王力、关锋被抓起来了，当时说先关王力、关锋，留下戚本禹加以分割。以后，戚本禹的活动更频繁。1968年1月，把戚本禹也关起来了。

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最先发迹，也是最早倒霉的暴发户。他们得意的日子不长，却罪恶累累，他们的垮台是罪有应得。例如，煤炭部长张霖之的死就同江青、戚本禹有关系。1966年12月，戚本禹学江青的舌，在矿业学院的大会上说“张霖之是彭真的死党”，鼓动学生“要集中炮火狠狠地打击”。结果，张霖之被造反派残酷批斗和刑讯，不到一个月就被折磨死了。

也是在江青的唆使下，戚本禹策动中南海里造反派贴朱老总的大字报，诬蔑朱老总是“黑司令”、“大军阀”。在1966年11月的一个夜里，在中南海、全国妇联、北京的大街上贴出了“打倒朱德”、“打倒康克清”的大标语。戚本禹还到人民大学去煽动，透露人民大学的副校长孙泱曾给朱老总当过秘书，要造反派通过搞孙泱的问题，“把朱德的问题搞清楚”。一夜之间，在人民大学校园内外，贴出了许多“打倒朱德”的大标语。在1967年2月初，人民大学的造反派开始组成“揪朱联络站”。

1967年3月，戚本禹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来头很大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对刘少奇大肆污蔑，恶毒攻击刘少奇是什么“假反帝、真投降”，“日夜梦想着复辟资本主义”，“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而是“假革命”、“反革命”、中国的“赫鲁晓夫”。戚本禹因此声名大噪、红极一时。

与此同时，戚本禹还唆使韩爱晶等人贴“打倒陈毅”的标语，在首都组成“批陈联络站”。1967年4月，戚本禹在陪同陈伯达接见“批陈联络站”等组织时，鼓动说“外事口的盖子还是要揭开”。一时间在外事口、外交部等单位又掀起了揪斗陈毅的风。

1967年5月中旬，江青把他们从上海弄来的一份诬陷周总理的材料《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送给林彪、康生和周总理，还居心叵测地写了一封信，说红卫兵“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恩来），要求同我面谈”。周总理为此不得已写信向毛主席报告，附上有关历史材料说明真相。这个启事是1932年国民党在上海伪造的，周恩来当时已到了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康生知道这件事，陈云、康生他们当时在上海还及时揭穿过敌人的阴谋。在毛主席的阻挡下，江青等人的罪恶阴谋才没有得逞。此事，听说戚本禹也是搞了一手的。

1967年7月中旬，彭德怀同志被残酷批斗，也是在戚本禹的怂恿下，韩爱晶等人对彭老总大打出手，把硬铮铮的彭老总的肋骨都打断了。戚本禹的罪行，在这里只能举一些例子。

“王、关、戚”倒台以后，周总理专门找了谢富治去谈，后来把我和傅崇碧也一起找去参加谈话。周总理向我和傅崇碧明确交代，要把与“王、关、戚”有关的人员，清理出市领导机关。

我们回去，经过研究，首先把杨远抓起来了，让周景方等学部的人统统回了原单位。周景方回到学部后，另一派认为戚本禹已经倒台，也就一下子呼啦起来，声势很大，揪斗了周景方等人。周总理让我们贴出类似布告的东西，要求不要揪斗。后来，周总理让以监护的名义把周景方逮捕了，是傅崇碧去执行的。

由戚本禹派到市委的学部和其他单位的人全部回到了原单位，对市革委会以及党委成员，如“五大领袖”和其他学生中的造反派头头、工人造反派，学生毕业的就分配了，工人造反派的人员回到原来所在的工厂，这个活动清理出去了一百四五十个人。市革委会里这样就几乎没有人了，工作又近乎瘫痪，不能开展。市革委会抓紧陆续从部队“三支两军”人员中调来一些表现比较好的同志，从中央各部委调了一些没有什么派性的同志，又加上原市委下放的一些干

部，这样就等于重建了市里的领导机构，等于又一次改组。

调来的新同志是五湖四海，大部分不是造反派。原来革委会领导机关存在两派的问题一时没有市场，慢慢地在消除。

这些步骤都是周总理和我们商量、给予指示和我们想了办法的，很多人不晓得这个情况。

这是谢富治期间出现的一波。原来都是造反派，后来“王、关、戚”倒了以后，清除了一下。清除后，重新组织了市革委会的领导机关。周总理当时明确地说：那些人不清理，你们市里稳定不了，你们也工作不了。

这以后，1968年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成员。1968年的时候，具体的月份我记不清了，外国语学院“红旗”造反派成员章含之向毛主席写信，告市里谢富治的状。她说谢富治支持的一派“六一六兵团”是反周总理的，是反周保谢的，海军宣传队进驻外国语学院后一屁股坐在“六一六兵团”一边。

章含之教毛主席读过英语。毛主席当时对她的信作了批示。批示大意是批评北京市不抓“五一六”，说要市委解决这个问题不容易，要周总理出面去解决外国语学院的问题。毛主席还说：“五一六”从极左跳到极右。

以后又有一次，汪东兴同志找我去阅看毛主席对市里有关北师大的一个报告上的批示。毛主席的批示又批评北京市，说就是不抓“五一六”。在北京市报告中提到“有些造反派是坏人，也可能是‘五一六’分子”的地方，毛主席的旁批写道：这就好了。

这样一来，谢富治很紧张。周总理找谢富治谈过话，内容我不清楚。谢富治回来告诉我们，周总理指示要李作鹏、谢富治和我研究解决外国语学院的问题（到外国语学院“支左”的是海军）。周总理提了三条：一是“支左”海军军宣队作检讨；二是市革委会作检讨；三是海军的“支左”人员撤出大部分，留下一小部分，派8341部队进驻外国语学院领导斗批改，这样可以使海军、北京市革委会解脱出来。

市里派谁去检讨呢？谢富治去不合适，因为有人保他，也有人反他。就确定由我、丁国钰、刘绍文同志一起到外国语学院大会上检讨，我们检讨时，上纲到我们犯了方向性的错误。以后，我们就不管外国语学院的事了。

这以后，江青、谢富治开了市革委各部门的大会，动员抓“五一六”分子。

到底有没有“五一六”反革命组织？一时难说。在北京是有过反周总理的“五一六”造反兵团。1967年5月底，北京钢铁学院的张建奇为首成立了“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兵团”，6月2日，张建奇就贴出给周总理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提出23个问题责问周总理，大字报贴在了很多地方。紧接着，大概在6月14日，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兵团”的头头刘令楷与张建奇等人，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筹划成立了“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当时，社会上反击所谓“二月逆流”的风潮正趋于高峰，外国语学院的“六一六兵团”就对陈毅发起进攻，矛头指向周总理。

1967年七八月间，以北京钢铁学院的“五一六”一派反总理为起端，许多污蔑攻击周总理的反动传单，贴到了北京市的一些闹市区，什么“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周恩来”，“周恩来之流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等等。反动传

单上署了“首都六一六红卫兵团”的名。打击这些反动行为，打击这些造反群众组织里的坏人是必要的。但到底有没有一个经过填表的严密的“五一六”反革命组织，这却是清查过程中发生的疑案，恐怕是逼供信的产物。什么是“五一六分子”？好像是以反周总理为标志，实际上包括涉及“揪军内一小撮”等问题都在内，也就是所谓“三指向”者，把矛头指向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向了人民解放军的，指向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的，摊着一项，就都是以“五一六分子”论了。“五一六”定性的扩大，使“五一六”问题大无边际，成为了全国性的问题。“五一六”问题愈是严重扩大，所谓“五一六”的反革命组织问题就愈是被搞得玄而又玄。最后，不仅在北京抓“五一六”分子，而且在全国抓“五一六”分子。这里固然打击了一些造反上来的坏人，但也使许许多多无辜的干部和群众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害和打击，特别是当对立的两派在互揪对方的所谓“五一六”问题时，造成的扩大化就更可怕了。

抓“五一六”问题也时伏时起，1970年3月27日，中央又发出了《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指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要求进行清查和重点揭露它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周总理找我谈话，说毛主席指定我任抓“五一六”的办公小组的组长，公安部的李震任副组长。

这时，各机关开始抓“五一六”分子，提出查他们的登记表、组织情况等等，我们怎么查也查不出来东西，只有钢铁学院的“五一六兵团”，反对周总理的比如“六一六”等组织都是“五一六”分子，戚本禹是反对周总理的，搞周总理的什么“伍豪启事”，该是大号了吧。

我们开了若干次小会，也没有发现有什么登记表和组织情况等线索。但谢富治在报告中仍然说“五一六”是有组织的、有后台的等等。

北京市也组织了一个抓“五一六”的办公室，由市委宣传部部长张铁夫负责这个工作。就在这个时候，北京的一些工厂被坏头头夺了权，那时，各级都在夺权，很多工厂因此停产。有一部分工人造反派的头头很坏。

北京市面临工矿企业的大面积停产危险，怎么制止？这时，周总理在外交系统作了一次反极左的讲话，我们就借这个形势，提出反极左，把一些破坏生产的坏头头、打砸抢很厉害分子作为“五一六”问题来抓。

市里开始成立的叫“批清”办公室，临时调了一二十个人，主要是“三支两军”的同志多一些，负责人是市委宣传部部长张铁夫和李立功。批极左思潮，市里发了一个提纲，这个提纲是针对蒯大富搞的极左谬论的，突出抓了“造谣一千次就变成真理”、“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要踢开党委闹革命”等等这样的谬论。这次批极左思潮搞了一段时间。借此解放了一批老干部，提起来了一批老工人负责生产，发动群众，稳定了生产。

1970年春，市里就布置清查“五一六”。一开始，下边就有个问题，有的单位就交代了：有组织，叫做“五一六兵团”，还有什么政委、兵团司令。说得头头是道。有的人还交代填了什么表。这样，就有一阵子追查组织甚至有的单位就追查表。这就搞得触动的人比较多一点。

这样搞了几个月，大概搞到最多的时候是群众揭发出来涉及五万多人，触动的有一万四千多人，下边报上来的重点人是七百多人。办留宿学习班，全市最多时有三千人。

有一段时间，下边报上来的揭发数字天天往上涨。发现不对头了，哪有这么多人，如果是反革命组织怎么能弄到那么多的人呢？张铁夫很怀疑，就向市委汇报。市委专门开了一次常委会，决定抓住一头，甩开一头。所谓抓住一头，就是抓住几个反革命案件，指在“文化大革命”

命”中间发生的几个重大案件和重要人物，查事件、查人物。所谓甩开一头，就是不要追什么组织、什么表，一般的，没有罪行的，就不要去折腾人家了。

这以后就集中力量，查事件、查罪行，逐渐搞了核实、定案。

当时，我们组织查了几个事件，是涉及到全国性的东西。一个是围困中南海，几十万人安营扎寨；一个是火烧英国代办处；一个是午门大会，就是香港问题。这三个都是对着周总理的。

在清查中发现他们有一句口号，叫做“要揪一个永远健康以下的、保人保得最多的、揪出来让你吓一跳的人”，矛头所向清清楚楚。

以后，我们在清查中提出了一个口号，就是“谁反总理，谁就是反革命”。我们清查的这几个事件，都涉及到他们反总理。围困中南海，他们就是想把总理轰出来，戚本禹就逼周总理搬出中南海。然后，他们冲进去，抓刘少奇，再嫁祸周总理，他们是这么个阴谋。火烧英国代办处也是这样，总理负责外事嘛。午门大会也是这样。

查了这三件事，基本上查清。比如围困中南海，那时不是有“天派”、“地派”吗，实际上查来查去，“天派”、“地派”是一家，都是陈伯达、戚本禹他们在指挥的，在反总理上，他们是一致的。虽然“天派”、“地派”也有矛盾，但根子是一个。

在北京市我们主要查清了几个重大武斗事件，一个是西单商场武斗，破坏性很厉害的，死了人。那是“财贸尖兵”干的，头子是洪振海，后来抓起来了。友谊商店的王景瑞也是头头。百货大楼的武斗、永定门粮库的武斗、琉璃河水泥厂的武斗，都造成很大破坏，也是伤了人、死了人的。

另外一些事件，比如西郊的张兆庆，还有一个王洛宾，是造反派的头头，他们准备在西郊搞一个大公社，搞一块根据地，是戚本禹指挥的。二七厂的徐凯，他是准备把铁路系统抓在手里的。还有一个矿冶学院的造反派头头，名字记不起来了。

随着这几个事件查罪行，查到罪行联系到这些头头，解决事件的发动者和幕后操纵者。还有周景方从学部带来的一批夺权的人，他们来后把持了市里的几个主要口，比如建筑。这些人都是支持造反的。还有参加工代会的那几个造反派头头。

就是通过这次清查，把“五大领袖”拿下来的。把“五大领袖”拿下来，批判、查清了他们的罪行，然后把他们下放去劳动改造。张铁夫他们写了材料、写了报告。我传达了毛主席对这几个人区别对待的意思：谭厚兰是不行了；韩爱晶是蒯大富的军师；聂元梓的问题牵涉到林彪的问题，没有查清，放一放；王大宾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可以安排工作、给出路。

粉碎“四人帮”以后，北京市又把这些人都抓起来，批判了一下，批判的材料就是当年的那些，没有新的。

我们后来还想给点出路。谭厚兰劳动改造表现比较好，认罪态度比较好，写过几次认罪书。谭小的时候是童养媳，很苦的。后来做了小干部，送到北师大学习的。我们考虑到这些，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想让她回老家当个小学教员，她四十多岁了，没有结婚，还可以找个对象。但以后没有弄成，她病死了。

包括“五大领袖”，是什么罪就是什么罪，是反革命就是反革命，是敌我矛盾就是敌我矛盾，

你是打砸抢分子就是打砸抢分子，你有人命案就按有人命案处理。我们最后核实定案的结果，这个数字不是十分准确，大概是这样：定了10个；待批的有22人，当时有些人市里批不了，要报上去批；另外还有14个挂着的人，当时，重点人物总共有46人。

此外，还有敌我矛盾当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43人；犯有严重错误的608人，其中有200多人是要给适当处分的。这是1973年时的一个统计材料。

这就是结果，清查“五一六”开始不是说扩大化了吗？以后市委就掌握逐步落实政策、逐步定案。当时是根据人证、物证、旁证，核实定案的，没有这三条不行，不能光凭个人口供，最后还要给出路。

再补充一下，我们当时还查了两个案子。一个是讨孔，就是谭厚兰组织小分队到曲阜破坏孔庙；再一个是谭厚兰反大庆，她组织了一个班子到大庆去揪王铁人，记得好像把大庆的火车站都砸了。

对清查“五一六”，不能一概而论，只讲扩大化的这一面，我们后来查的这些都是反革命案件，讨孔破坏很大，现在公安部还有他们破坏的纪录片，他们是打、砸、抢、烧。

我们清查“五一六”中间，还搞了“一打三反”。这中间有人写匿名信给毛主席，告状说我打击了造反派，要复辟。毛主席把信转给了我，毛主席在信上用红铅笔批示：“五一六”是极少数，早抓起来了，是不是没有注意政策，请市委酌处。

我们商量说：抓“五一六”扩大化了，我们只好认这个账。现在就按毛主席的批示精神，落实政策，统统把“五一六”分子的帽子给他们去掉。北京市有关“五一六”的情况，张铁夫很清楚，毛主席的批示落实，以及摘帽子等工作都是他来负责的。

为此，李震提出要向上写个报告，他写了一个。我提出“五一六”抓也抓不到，怎么写呀？而且毛主席已批评了，就不要再写什么报告了。李震还想向下发个指示，说明政策界限等。我也不同意。我说毛主席指定我们成立联合办公小组，周总理找我谈话时，我就提出过应该有个政策，周总理当时拿着事先准备好的延安肃反时的九条方针说，就按这个原则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办。现在还想搞个政策界限，这没有必要，而且很难，没有查出“五一六”有什么证据，你怎么能够提得出区别政策来呢？后来报告没有报，指示也没有发。

这是抓“五一六”的情况。毛主席讲是极少数，“王、关、戚”已经抓起来了。但一开始可不是那样，章含之的信毛主席批了，北师大报告毛主席也批了，中央文革小组江青出面和谢富治召集大会，动员抓“五一六”。北京市抓了一下，就是批极左40天。毛主席一批就没有“五一六”了，所有市里抓的“五一六”，主要是工厂的，统统把“五一六”分子的帽子都摘了，这样就没有“五一六”分子了。一场声响很大的抓“五一六”的运动就此结束，但留下的后遗症却不是一下子就能消除的，在一段时间里，人们要轮流地吃它的苦果。

□ 原载朱元石记录整理的《风雨十年记事》第四章，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本期编辑：《华夏文摘》执行编辑：《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 hwx-info@cnd.org 英文文件: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 (WWW) 地址: <http://www.cnd.org/>
